

族群接觸與身份建構：

以恆春阿美族人的歷史遷徙為例^{*}

簡明捷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助理

* 本文曾於研討會中宣讀，評論人翁佳音教授給予意見指正，特此致謝。簡明捷，〈族群接觸與主體建構——以恆春阿美族人的歷史遷徙為例〉，『2010年南臺灣歷史與文化學術研討會』（高雄：高苑科技大學），2010年5月20日至21日。

摘要

本文從恆春阿美族人歷史遷徙的族群接觸過程，討論族群接觸經驗如何建構族群認知。

本文採取的方法採用文獻整理與田野踏查兩者並重，歷史文獻提供了區域族群人口比例與族群組成，田野資料則反映出族群群體間因接觸所產生的認知，文獻與田野踏查兩者之間的對話由筆者提出時空脈絡觀點的解釋，讓文獻提供的背景與調查所得之線索能夠合理的得到理解。

由恆春阿美族人歷史遷徙中自我表述，受到時空背景而有不同的族群接觸與認知經驗，這些經驗並且成為恆春阿美族人自我表述的元素之一。

關鍵字：族群接觸、族群關係、族群認知、恆春阿美族、阿美族、遷徙、遷移

壹、前言

本文從恆春阿美族人遷徙過程中的三個場景，來討論族群接觸的歷史經驗，作為理解族群認知建構的途徑。恆春阿美族各部落多數位於恆春半島東面，沿滿州港口溪流域分佈，因牡丹社事件的影響、衛生條件因素與漢人移住等原因，清同治年間開始往東部移動，在臺東關山、池上一帶建立部落，最遠到達花蓮新城，移動與遷徙一直延續到日治昭和年間。¹本文以大正14年（1925年）由港口部落遷徙到達花蓮新城的案例，討論過程中的族群接觸經驗。

過去的研究常將文化視為一個獨立封閉的體系，鮮少將（一）族群接觸時間點。（二）區域性族群組成與互動。兩項因素加入，而遺漏了歷史、空間與族群本體三者交互作用下所產生的動態文化。族群組成的部分因屬於歷史時代，資料借重歷史文獻輔助，族群接觸則由田野調查中所得到的線索分析後，來拼湊出族群互動的歷史場景。我試圖藉由這個歷史的研究來指出：不同時間點的族群接觸，因涉及族群組成的差異，將影響到區域群體間的界定與定義，並反映在不同文化與身份的群體指稱上，甚至成為族群認知自我主體的方式之一。本文所敘述的三個歷史場景中，恆春阿美族人受到族群主客關係的、時間與空間背景影響，而出現不同經驗的族群認知；由Amis→滿州→恆春人，這些經驗並且成為恆春阿美族人自我表述與認知建構的元素之一。

本文中出現的族群依照各地區而有不同，部分族群在學術性的分類與當地的使用上有差異，例如分佈於屏東恆春鎮、滿州鄉的排灣族，當地自稱為斯卡羅族，斯卡羅（seqalu）意指來自知本溪的人，目前在

1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東京：刀江書局，1935年），頁531。林聖欽，『花東縱谷中段的土地開發與聚落發展』（臺北：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頁47、107。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臺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1年），頁222。陳榮發、夏黎明等（著），《池上鄉志》（臺東：池上鄉公所，2001年），頁161。

公告的原住民族官方分類上列為排灣族。²布農族主要分佈於中央山脈的高山地區，以花東縱谷為分佈東界。日本時代之後人類學者將其命名為「武崙族」或「布農族」，按照地區與社群分為卓社、卡社、巒社、丹社與郡社與蘭社群六群，布農族目前為官方所公告認定之原住民族之一，在本文脈絡中出現在日治時期的臺東池上，被恆春阿美族後裔稱為 Vanuan。太魯閣族主要分佈於中央山脈東側木瓜溪、立霧溪、和平溪等流域，日本時代戶籍歸類上為生蕃，按照人類學者的分類屬於泰雅族，目前屬於官方承認的原住民族之一，戰後因認同意識與民族自覺爭取正名，於民國93年（2004年）獨立為太魯閣族。太魯閣族人出現在日治昭和時代之後的新城，因為生活上協助恆春阿美族人躲避颱風引起的海水倒灌，被恆春阿美族人稱為朋友（Lobon）。

西拉雅族人清代被歸類為平埔族之一，分佈在嘉南平原沿海，共分為五個大部落。日本時代的學者伊能嘉矩將其獨立稱為西拉雅族，之後語言學者也同意西拉雅族的大分類稱呼，並包含了西拉雅族、馬卡道與大武壠四社（又稱為大滿族）的三個亞族。³因此，目前使用「西拉雅族」這個詞彙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指包含西拉雅族、大武壠四社與馬卡道族三亞群的概念，一個是狹義指原來居住在臺南地區的西拉雅族人。本文所用的西拉雅語詞概念，是狹義的西拉雅族，指清代原居在臺南平原的新港社、目加溜灣社、蕭壠社、麻豆社、大目降社等部落族人。大武壠四社，是原居臺南玉井盆地的平埔族，清代文獻稱為大武壠頭社、（大武壠）二社、茄拔、霄里等社，⁴日本時代經語言學者分類後除了稱呼為大武壠四社外，也稱為大滿族。馬卡道族分佈在屏東平原沿海，分為力力、茄藤、放索、下淡水、上淡水、阿猴、塔樓、大澤磯八個部

-
- 2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之一》（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年），頁52。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380。
 - 3 李國銘，〈屏東平埔族群分類再議〉，收錄於《族群、歷史與祭儀》（臺北：稻鄉出版社，2004年），頁71-72。李壬癸，〈臺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收錄於《臺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臺北：常民文化出版社，1997年），頁53-54。
 - 4 石萬壽，《臺灣的拜壺民族》（臺北：臺原出版社，1992年），頁18。簡炯仁，〈高雄縣甲仙、杉林及六龜等鄉的「大武壠社群」〉，收錄於《高雄縣平埔誌》（高雄：高雄縣政府，2000年），頁302-308。

落，清代文獻上記載為鳳山八社。⁵

西拉雅族、大武壠四社與馬卡道族，因原居平原地區而在清代文獻上記為「熟蕃」或「平埔蕃」，日治時期除了學術界開始將原住民分類，而出現有各族的獨立名稱之外，仍以戶籍登記上的「熟蕃」來作為與漢人主要的區隔。目前，西拉雅、大武壠四社與馬卡道族皆非官方所公告之原住民族之一，其中西拉雅族被臺南縣政府認定為縣內原住民族之後，成為第一個獲得地方政府認定的平埔族群。⁶另外，清代居住於宜蘭平原的噶瑪蘭族，有哆囉美遠、棋立丹、抵把葉、打馬煙、抵美簡、流流、幾立板、抵美福、辛仔罕、奇武暖、打那岸、奇武蘭、奇武荖、里荖、珍珠里簡等等36個部落以上，⁷日本統治臺灣之後戶籍歸類為熟蕃籍，戰後於民國91年（2002年）重新被官方認可為臺灣的原住民族之一。

臺灣西南部的西拉雅族、大武壠四社與馬卡道族與宜蘭的噶瑪蘭族，在清代已遷移到恆春與臺東、花蓮，⁸有些遷徙到新部落後混入了其他族群，本文在認定上以其部落的文化特徵與強勢族群為主要指稱，像是將恆春半島滿州鄉永靖村的平埔族歸類為馬卡道族，池上富里一帶的平埔族歸類為大武壠四社，以呈現被泛稱為西拉雅族的不同亞族差異。大武壠四社是否可稱為族仍有討論空間，故暫保留大武壠四社的用語。這些西拉雅族、大武壠四社、馬卡道族、噶瑪蘭族是學術性的分類，而在民間則一律歸類在戶政法律上的熟蕃，並通稱為平埔族。本文

5 李國銘，〈鳳山八社舊址初探〉，收錄於《族群、歷史與祭儀》，頁17-33。

6 段洪坤・陳淑倬，〈西拉雅族成為縣定原住民族的過程及其影響〉，《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報》25（臺北：政治大學），2006年12，頁145-165。

7 清水純（原著）・余萬居・吳得智（翻譯）・詹素娟主編・校閱，《噶瑪蘭族—變化中的一群人》（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1年），頁27-30。

8 平埔部落的遷徙，在清代史書中已經有所記錄，如西拉雅族蕭籠社遷徙至吉貝要部落的記錄等等，而日治初期伊能嘉矩的採訪報導中也發現恆春半島、花東縱谷已經有平埔族人的村落了。戰後張耀錡則將平埔遷徙情形，繪圖說明，收錄於其《臺灣平埔族社名研究》一書中。相關資料詳見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註），《臺灣踏查日記（上）》（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年），頁303-304、311。張耀錡，《臺灣平埔族社名研究》（臺北：南天書局，2003年）附圖B。各族群遷移與分佈系統性的整理介紹中，西拉雅族可見石萬壽，《臺灣的拜壺民族》，大武壠四社可見簡炯仁，《高雄縣平埔誌》，馬卡道族可見簡炯仁，《屏東平原平埔族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年）。各族遷移至花蓮、臺東之分佈與詳細討論，可參考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年）。

在恆春滿州、臺東池上與花蓮新城，都有平埔族的存在，只是指涉對象各有不同，像是在恆春滿州平埔族指的是來自屏東的馬卡道族，在臺東池上指大武壠四社，而在花蓮新城則卻是指噶瑪蘭族或恆春阿美族人。

漢籍的客家、閩南人，因產業生計、族群互動上仍有差異與不同影響，故在文脈中各自獨立稱呼。閩南人一詞因在調查地點多稱為臺灣人、福佬人，下文共同以福佬人稱之。另外在漢族對於指稱各原住民族的用語「番」或「蕃」，描述清代時以「番」字、描述日治時代時以「蕃」字，以各朝代對於人群歸類的用字為依據，並無歧視之意。

本文最早為個人之碩士論文『族群、歷史與邊界——恆春群阿美族人的遷移與認同』之一部份，爾後於2010年加入池上的歷史資料與調查，整理修訂後先口頭發表於『2010年南臺灣歷史與文化學術研討會』，後又承蒙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予提供意見。唯本文為個人之寫作新嘗試，三個場景因涉及十數族群之背景、歷史文獻，且需交叉田野調查資料與歷史情境，雖然力求本文之完整，不足與疏漏之處由筆者自行負責，並作為未來修正、努力之方向。

貳、歷史場景與族群組成

阿美族人由北而南因分佈區域、風俗歷史被日本學者分類為奇萊阿美、秀姑巒阿美、海岸阿美、卑南阿美與恆春阿美五群。恆春阿美指的是曾經居住在恆春半島上的阿美族人，起源於清代因泰雅族賽德克群（現稱太魯閣族）勢力往立霧溪中下游發展影響，由原居地花蓮立霧溪下游南下遷到臺東，最後到達恆春半島。⁹

恆春阿美族人先在恆春半島西部的牡丹鄉石門一帶居住，後來因部落戰爭轉進恆春鎮後到達半島東部的滿州鄉港口溪流域，建立港口社、西片溪社，阿眉社、老佛社、萬里得等部落，當中以港口溪下游的港

9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391。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臺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頁222。

口社最為有名。清同治之後的恆春半島動盪不安，牡丹社涉外事件所帶來的日本軍人外，還有中國政府開山撫番政策所引入的漢人等等，外來勢力的進逼，讓恆春阿美族人無法好好生活，族人又陸續回到臺東、花蓮建立新的部落，¹⁰以花東縱谷的關山、池上、富里一帶為主要據點，最遠到達花蓮新城鄉。本文即以大正14年（1925年）至昭和初年由恆春港口部落遷往花東縱谷，落腳在池上後到達花蓮新城的遷移歷史為背景，¹¹解讀三個不同歷史場景中的族群組成與接觸。

恆春港口部落族人在大正、昭和年間的遷徙按照其時空脈絡，主要可分為三個歷史場景：（一）遷移前的「恆春滿州」。（二）遷徙過程與臨時停留的「臺東池上」。（三）新部落「花蓮新城」。接下來本文以三個地點的日治時代人口資料，用人口比例來理解各區域的族群組成。

10 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臺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2001年。頁221－223。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531。林聖欽，『花東縱谷中段的土地開發與聚落發展』，頁47、107。陳榮發、夏黎明等（著），《池上鄉志》，頁161。伊能嘉矩、栗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東京都：草風館，2000年），頁225。烏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探險臺灣》（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年），頁285。

11 歷史遷徙過程詳見簡明捷，〈恆春群阿美族的分佈與遷徙—以大正十四年港口社的遷徙為例〉，《臺東文獻》12（臺東縣：臺東縣政府），2006年10月，頁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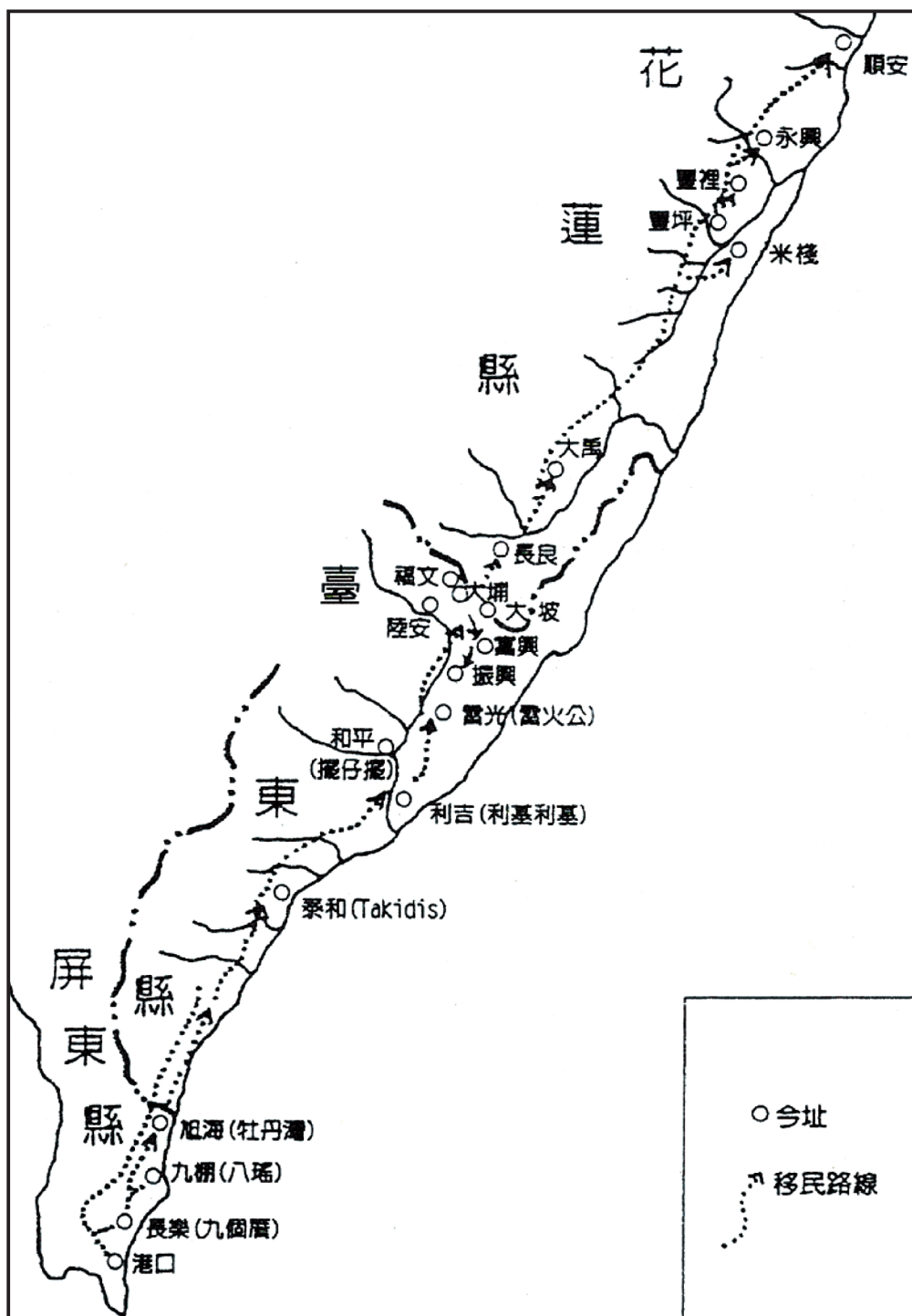


圖1：恆春阿美族遷徙圖

出處：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阿美族史》，頁215。

一、恆春滿州

恆春半島一直是一個多族群活躍的地區，以今日恆春鎮、滿州鄉兩個行政區來說，就有斯卡羅族（排灣族）、馬卡道族、阿美族、漢人至少四個族群。

斯卡羅族（排灣族）早於阿美族人、客家人來到恆春半島與滿州，清代在半島上有里德、射麻裡、貓仔、龍鑾四個部落、統領大小不一十幾個部落，成為恆春半島上的地方領袖，接受各部落的進貢。¹²馬卡道族原居於屏東平原，清道光年間往南遷徙到恆春半島，恆春東門外山腳與射麻裡（永靖）為主要據點，之後有一部份族人繼續遷徙至臺東、花蓮。¹³恆春的阿美族人也在清代就到達恆春半島，主要在東面沿著港口溪分佈居住，形成八姑用阿眉社、阿眉番大射社、萬里得阿眉社、治平里大加冬庄阿眉社、八礮阿眉社與羅佛阿眉社等部落，多數都直呼阿美族而稱為阿美社，當中以港口溪流域下游的港口部落最為有名。¹⁴

恆春半島上的漢人主要有閩南的福佬系漢人與廣東客家系漢人，以臺灣內部的二次移民，其次少部分是由中國直接到達恆春半島。漢族的福佬移民進入恆春半島後，以西面的恆春為主要分佈地，客家移民由屏東六堆地區進入恆春半島，在半島北面與東面為據點，車城的保力庄為重要灘頭堡。入墾初期的客家移民就已經涉入恆春當地部落社會頗

12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臺灣踏查日記（上）》，頁297註49。斯卡羅族因勢力強大，附近排灣族、阿美族、平埔族、漢族部落，都臣服他們，因租用土地而每年繳納蕃租。屠繼善，《恆春縣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9。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之一》，頁99。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128、129、299、531、534。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臺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頁221 - 223。

13 伊能嘉矩於明治30年（1897年）11月4日在恆春東門山腳遇到當地馬卡道族人頭目陳阿三。之後於11月11、12日到達新開園（池上）、大庄，記錄中提到公埔、池上、大庄有平埔族人居住。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臺灣踏查日記（上）》，頁303、311 - 315。

14 《臺灣府輿圖纂要》記載：有由「內山」遷徙而來的「亞眉番」與「亞眉社」。不著撰人，《臺灣府輿圖纂要》（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臺灣文獻叢刊181種，1963年），頁69。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地輿全圖》，（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頁63 - 66。在《恆春縣志》正式列名的阿美族部落中僅有五社，而治平里大加冬莊阿眉番社則出現於恆春縣卷一疆域一節。屠繼善，《恆春縣志》，頁28、30、32、105、109、128、129、310 - 311。

深，像是參與了咸豐5年（1855年）的部落間的戰爭，¹⁵之後並逐漸進入半島東側，在清嘉慶、道光年間在港口溪流域上游、中游進行農業耕作與建立村社。清末的光緒年間，港口溪流域所有適合灌溉的地點，都已經有客家移民的出現。¹⁶客家移民因為農業耕作，將水稻與灌溉技術傳授給阿美族、斯卡羅族（排灣族）人，甚至讓阿美族人開始信仰土地公。¹⁷

清代的斯卡羅族（排灣族）與阿美族，屬於恆春縣內的招撫番社，因為已經有土地產權概念而與漢人訂有土地契約，不過在日本時代之後，原住民居住區域的山地行政區內產權一律歸屬國家，為了解決土地私有的情形，明治37年（1904年）滿州庄被獨立於山地行政之外，改列為平地行政區。¹⁸因為行政區劃的改制，轄區內斯卡羅族（排灣族）與阿美族人都變成平地行政區內的原住民，戶籍資料改列為熟蕃，並開放漢人自由進出，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從表1的滿州人口資料中可以看出，大正4年（1915年）漢人的人口比例佔有59%，已經超過人口數的一半以上，之後在昭和元年（1930年）漢人人數增加到3,000人左右，而熟蕃人數則無法估計，不過按照大正14年（1925年）與昭和2年（1927年）滿州庄人口數約為5,000人左右來估計，熟蕃人數應該在2,000人以下。從本表可知在日治大正年間的滿州庄，漢人人數超過六成，多數為來自保力的客家移民，為本區域內絕對多數的族群。

15 屠濟善，《恆春縣志》，頁121 - 122。

16 周玉翎，『臺灣南端尾閭恆春的族群與歷史（1867 - 1904年）』，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頁46 - 47。簡明捷，〈恆春阿美族人的土地公〉，《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2（2011年4月），頁160 - 161。

17 滿州庄客家移民將水稻種植與灌溉技術傳承給當地阿美族人的歷史過程，詳見簡明捷，〈恆春阿美族人的土地公〉，頁155 - 175。

18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蕃志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頁263 - 269。

表1：日治大正4年（1925）至昭和5年（1930）滿州庄人口數

滿州庄	漢人 （福佬、客家）	熟蕃 （斯卡羅、阿美族）	其他 （日本、中國人）	人口總數
大正4年（1915）	2,772（59%）	1,812（38%）	75（1.6%）	
大正11年（1922）			108	4,946
大正12年（1923）			104	5,107
大正13年（1924）			110	5,201
大正14年（1925）			127	5,163
昭和元年（1926）	3,000			
昭和2年（1927）		5,002	123	5,125
昭和3年（1928）		5,048	122	5,170
昭和4年（1929）		5,070	137 日本19人、 中國72人	5,207
昭和5年（1930）	5,772（77%）	1,545（20.7%）	178（2.37%）	5,321

說明：1、移川子之藏在昭和5年（1930年）前後的調查，則是建立在日本當局的統計資料，估計恆春阿美族人約在120 - 140戶之間，人數750 - 850人。

2、昭和5年（1930年）人口數5,321（含其他147）為現住人口統計，與國勢調查資料有出入。

3、明治37年（1904年）滿州列為平地行政區，轄區內斯卡羅與阿美族都屬平地行政區內的原住民，戶籍資料列為熟蕃。

出處：1、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國勢調查中間報：高雄州恆春郡昭和五年》，1933年。

2、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大正4年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概覽表》，1917年。

3、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現住人口統計》（大正11年到昭和10年），1923 - 1937年。

4、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表》1928年。

5、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大正14年國勢調查結果表》，1927年。

6、施添福（編），《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2001年。

7、移川子之藏（等），《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193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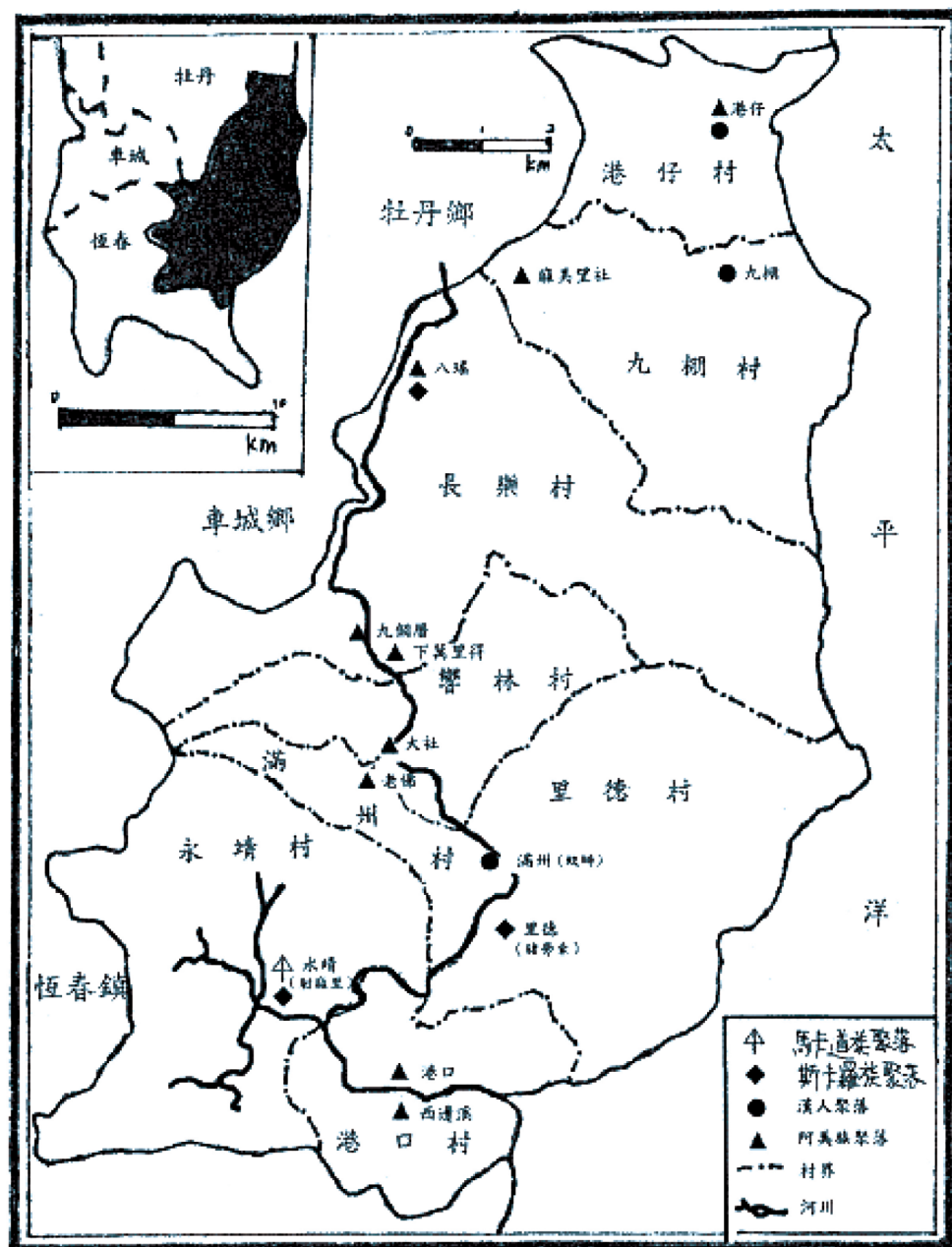


圖2滿州聚落分布
出處：筆者繪。

以滿州庄當地的各族群互動來說，屬於地主的斯卡羅族（排灣族）向清末來到此地的漢人、阿美族人收取地租，而客家移民又教給阿美族、斯卡羅族（排灣族）人水稻耕作技術，¹⁹三個群體在生活上的互動相當密切。

二、臺東池上

港口社的阿美族人於大正14年（1925年）離開恆春滿州的港口部落後，途經牡丹灣（旭海）、臺東太麻里、卑南後由花東縱谷一路北上。在縱谷這個狹長的地帶，分佈著清代開始就遷徙到這裡的西拉雅族、大武壠四社社人、恆春阿美族人。池上正好位於各股勢力的交接點，居住著恆春阿美族人、西拉雅族、大武壠四社，以及日治時期由西部、南部來到這裡的漢籍福佬與客家人等，以下分別介紹各族群在池上的分佈與遷入歷史。

池上以北的玉里、富里與池上一帶，是布農族、卑南族的勢力緩衝交界，清代原居臺南附近的西拉雅族，於清乾隆年間開始往東邊丘陵遷徙，之後部分輾轉往南遷徙到恆春半島，以及東部的縱谷地區形成部落，較大的部落在富里、玉里與池上大坡一帶。大武壠四社族人，在清乾隆年間往甲仙、六龜、杉林等高雄沿山地帶移居發展，一部份則往南到恆春與花蓮、臺東，在玉里、富里、池上建立部落，以富里的大庄最為有名。²⁰本節所討論的池上有萬安、新開園（錦園）、大陂、水墜（富興）等幾個村社。²¹

池上以南的池上、關山、鹿野，多恆春阿美族人的部落，以臺東池上的大坡最具有代表性。²²花東縱谷南段的恆春阿美族大多數都曾住過滿州港口溪流域，只是因為滿州庄改為普通行政區後，進而讓當時住

19 斯卡羅族因勢力強大，附近排灣族、阿美族、平埔族、漢族部落，都臣服他們，因租用土地而每年繳納蕃租。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臺灣踏查日記（上）》，頁297註49。簡明捷，〈恆春阿美族人的土地公〉，頁155 - 172。

20 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年），頁123 - 129。張耀錡，〈社名對照表〉，南天書局，附圖B。

21 陳榮發、夏黎明等（著），《池上鄉志》，頁160 - 161。林聖欽，『花東縱谷中段的土地開發與聚落發展』，頁47。

22 陳榮發、夏黎明等（著），《池上鄉志》，頁186。

在滿州的阿美族人身份登記成為住在普通行政區的「熟蕃」，早於行政區劃搬離滿州而到達池上的阿美族人則列為「生蕃」。²³因此花東縱谷的阿美族人，雖然與遷移的滿州阿美族人屬於同鄉，因為行政編制改制的因素，而有不同的身份編制。日治時期的池上，恆春阿美族人已經建立的部落有清代建立的大陂社、水墜（富興），日治之後因為人口逐漸增加的關係，族人也開始向外擴散，像是大正年間由大陂社遷出的而形成的大埔部落；²⁴由人口資料之知阿美族人佔了池上人口的一半以上。

日本政府為了發展東部產業而大刀闊斧的進行各項基礎調查，日治大正年間東部土地調查與業主權陸續查定完成，開始著手進行產業發展計畫，非常需要有人力來支援各項工程，讓當時的東部充滿著工作機會與發展前景；以池上為例，當時除了建立新武呂溪灌溉的圳道外，昭和元年（1926年）之後因東線鐵路全線通車，池上漸漸成為人來貨往的重鎮，吸引西部的客家、福佬移民同時湧入池上。²⁵漢人以交通便利的錦園（新開園）、大陂、萬安、水墜（富興）部落與其他族群混居，以客籍人士略多。²⁶

23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蕃志稿）》，頁263 - 269。

24 陳榮發、夏黎明等（著），《池上鄉志》，頁160 - 161。林聖欽，『花東縱谷中段的土地開發與聚落發展』，頁47。

25 臺東縣後山文化工作協會（著），《臺東耆老口述歷史篇》（臺東：東縣文化，1999年），頁218。夏黎明，〈池上平原文化景觀的空間過程——土地、社群與國家的論述〉，收錄於夏黎明、呂理政（主編），《族群、歷史與空間：東臺灣社會與文化的區域研究研討會論文集》（臺東：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0年），頁165。孟祥瀚，『臺灣東部之拓墾與發展（1874 - 1945年）』（臺北：師大歷史學研究所，1988年），頁100。黃宣衛、羅素玫（修），《臺東縣史：阿美族篇》（臺東縣：臺東縣政府，1997年），頁422。陳榮發、夏黎明等（著），《池上鄉志》，頁177。

26 除了由池上日治人口組成可知客家族群略多外，由臺東大區域的人口增加也同樣呈現此情形。1915年包含池上、關山、鹿野的里壠支廳，客家人口為254人，1925年增加到客籍1,147人，超過福佬人961人。黃學堂、黃宣衛，〈臺東縣客家族群之分布及其社會文化特色〉，《東臺灣研究》14（臺東：東臺灣研究會，2010年2月），頁89 - 150。

表2：昭和元年（1926）－昭和7年（1932）間新開園區（池上庄）人口

新開園區 （池上庄）	漢人 （福佬、 客家籍）	熟蕃 （恆春阿美族、 大武壠四社、西 拉雅族）	生蕃 （恆春阿 美族）	其他 （日本、中國人）	總數
大正14年 （1925）	漢人、阿美族、平埔族2,089人			日本人38人 中國人7人	2,134
昭和2年 （1927）	漢人、阿美族、平埔族2,149人			日本人21人 中國人10人	2,180
昭和3年 （1928）	漢人、阿美族、平埔族共2,246人			日本人23人 中國人8人	2,277
昭和4年 （1929）	漢人、阿美族、平埔族共2,218人			日本人18人 中國人10人	2,246
昭和5年 （1930）	漢人、阿美族、平埔族2,245人			日本人30人 中國人72人	2,389
昭和6年 （1931）	漢人、阿美族、平埔族2,473人			日本人48人 中國人15人	2,536
昭和7年 （1932）	957 客家600、 福佬357、	643	1,007	日本人46人 中國人26人	2,671

說明：1、新開園區於昭和年間改為池上庄，包含新開園庄、萬安庄、池上村。

出處：1、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現住人口統計》（大正11年末到昭和10年末），1923－1937年。

2、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大正4年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概覽表》，1917年。

3、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大正14年國勢調查結果表》，1927年。

根據表2日治時期人口的統計資料顯示，池上在日治大正到昭和年間人口逐年成長，反映了各路人馬湧入池上的情形，在當地的人口組成上面，昭和7年（1932年）池上阿美族的人口超過三分之一、熟蕃（平埔族）的人口則佔約四分之一，當中的熟蕃包含部分來自滿州的阿美族人，但是較早在清朝時代來到池上滿州的阿美族人，則因為已經定居而在戶籍歸屬列而為生蕃。不過，居住日不到半年的流動人口，則以短暫居住的名義登錄在「寄留簿」內，不列為常態居住的人口統計中。因此，表2所顯示出的熟蕃人口中，可能也包含了明治37年（1904年）之後到此定居的恆春阿美族人，但是本文所描述的大正14（1925年）港口社的遷移案例，因為屬於短暫停留，因而沒有在定住人口數據之

內。²⁷人口數據內的資料顯示的人口組成與比例，多少可反應當時在池上族群的多元性，與身份類別的多樣性。

日治時期的花東縱谷的各族群分佈大致以池上為分界，池上以北的池上、富里、玉里有西拉雅族、大武壠四社的分佈，池上、關山、鹿野以南有阿美族人的勢力，兩族群開墾分佈與聚落都有重疊之處，而日治到達的漢人也都聚居在部落外圍，從主要部落分佈點來看，像是大陂、新開園（池上）等部落，有阿美族、西拉雅、大武壠四社社人與漢族，可以說是在出了家門後就會遇到不同的族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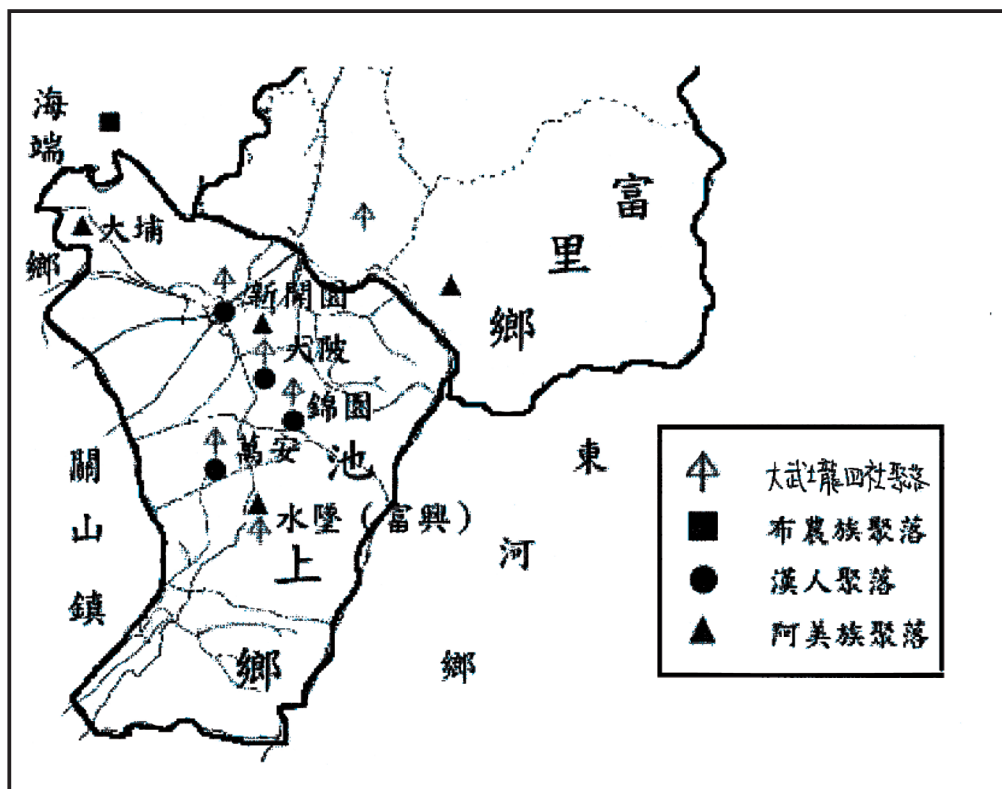


圖3 池上聚落分佈

出處：筆者修改自《臺東縣史：阿美族史篇》，頁119。

然而，在池上的西面山區，布農族與日本政府關係卻異常緊張。

27 〈新城戶籍舊簿〉註記中，可得知其停留池上為寄留，且天數未滿180天。〈滿州日治戶籍除戶簿〉則可看出部分恆春阿美族人至池上定住之情形。資料來源〈滿州日治戶籍舊簿〉、〈滿州日治戶籍舊簿：除戶簿〉、〈新城日治戶籍舊簿〉等。〈滿州日治戶籍舊簿〉可對照〈新城日治戶籍舊簿〉內，可理解其移動路線與停留天數。

大正初年，日本政府開始沒收原住民手中的槍枝，逐漸讓布農族人心生不滿，花蓮、臺東山地的警察駐在所，大正4年（1915年）開始遭受一連串的攻擊報復，被稱為「大分事件」。當年日本政府分別在臺東北面設立里壠支廳、花蓮港廳南面設立樸石閣支廳，並在臺東花蓮兩廳交接處，設立常態性的「複線式流電隘勇線式駐在所」，以防止布農族攻擊平原村社、鐵路與樟腦寮。²⁸大分事件後，布農族對於日本統治仍有零星的反抗，對於卑南族、阿美族人、漢人的出草行為也仍然存在，像是事件後的11年間（大正4年（1915年）到大正14年（1925年）），所發生的出草與攻擊事件就超過40件以上。²⁹布農族在這些事件中除了反抗日本警察駐在所之外，也對卑南族、魯凱族、阿美族人、漢人相互之間持續衝突，並進行出草行動，³⁰像是大正4年（1915年）池上大坡、富里蠻人埔、公埔等地都有被布農族襲擊、出草的經驗。³¹而對於恆春阿美族人來到池上前後的大正14年（1925年）年底、大正15年（1926年）年初之間，即在臺東里壠支廳也有一位漢籍臺灣人，在警備線旁被殺害。³²

恆春阿美族人的遷徙隊伍，從阿美族人的勢力臺東關山、池上一帶，要進入大武壠四社的池上、富里、玉里範圍內，加上西面山腳會有布農族人的威脅。除了移動前得瞭解各個族群部落的勢力範圍、敵對狀態，以及社會環境下布農族與日本政府之間的溝通穩定度，以免遇上敵

28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蕃志稿）》卷三，頁1037。卷四，頁11、12、16-17、19、27、28、36-39、43-44。

29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蕃志稿）》，卷三，頁9、10、14、35、37-49、54、138、142、153、159、160、162、163、175、179、182、186、187、194、202、203、205、207、211、215、227、231、233、235、236、337、266、275、305、384、385、409、442、445、448、472、486、543、571、573、578。第四卷：52、53、53、60、61、200、204、755、802、804。

30 卑南族被布農族出草的有〈呂家社原住民被高山原住民戕首〉，《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蕃志稿）》，卷三，頁337、384、385。阿美族人被布農族出草的有〈卑南阿眉原住民被高山原住民斬首〉，《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蕃志稿）》，卷三，頁54。漢人被布農族出草的有，〈大坡庄遇襲〉，〈拔仔庄鐵路旁遇襲〉，〈鈴鹿附近之兇案〉，《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蕃志稿）》，卷三，頁43、175，卷四755。

31 〈公埔製糖所遇襲〉、〈萬人埔附近遇襲〉、〈大坡庄遇襲擊〉、〈公埔庄遇襲〉，《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蕃志稿）》，卷三，頁40、42、43、44。

32 〈鈴鹿附近之兇案〉，《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蕃志稿）》，卷四，頁755。

對的部落及突襲的布農族人，這一段路程可以說是相當危險。

三、花蓮新城

離開池上經過富里、玉里等地，阿美族人在昭和元年（1926年）底之後陸續來到新城，³³當時新城是一個新成立的行政區，這裡除了南面有噶瑪蘭族人居住外，還有剛移民到這裡的福佬漢人。

恆春阿美族人到達新城之前，得先經過花蓮與新城交界的加禮宛社，這是清代由宜蘭平原遷居建立的噶瑪蘭族部落之一。噶瑪蘭族是原來居住於宜蘭的平埔族，清代遷至花蓮後，在今日新城鄉南面共分為加禮宛社、竹子林、武暖、七結仔、談仔秉與瑤歌6個部落，當中以加禮宛為最大部落，又稱為大社，也是各部落的領導者。³⁴

日本統治初期的明治年間，加禮宛一帶北面到新城之間的狹小平原，都算是今天被稱為太魯閣族的勢力範圍了，日本人的勢力只到達新城的加禮宛社與北埔一帶。像是明治29年（1906年）威里事件時，日人被太魯閣族人馘首25人，明治30年（1907年）時日人因冒犯原住民，而使得13名於監視哨點的日本軍人全數被出草身亡。之後，日人歷經多次和解皆無法完全控制住太魯閣族人。直到大正3年（1914年）日軍大規模討伐太魯閣族後，並設立研海支廳（後改為新城支廳），才大致穩定的控制住加禮宛以北的新城沿海區域。³⁵

加禮宛社北面到新城之間的狹小山腳沖積平原，海岸道路與太魯閣族人的部落僅有數百公尺的距離，加上冬季東北季風來臨時容易飄雨而視線不清，非常容易受到攻擊，明治末年、大正初年的攻擊事件猶言在耳，族人從加禮宛社往北到新城時，只得沿著最好走也是最安全的平坦沙灘，涉水通過三棧溪出海口後到達北面新城，並在沿海附近建立新聚落。

33 〈新城日治戶籍舊簿〉中顯示，昭和元年已經有族人遷入新城。

34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蕃語研究會，日昭和13年，1938年）頁21、118-119。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卷》（東京：刀江書院，昭和3年（1928年）），頁883。及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1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69年（1980年）），頁406。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頁115-116。

35 〈太魯閣事件顛末〉〈部分太魯閣群歸順〉，《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蕃志稿）》，卷一，頁71、630。〈討伐太魯閣原住民群〉，《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蕃志稿）》卷二（下），頁373-490。

三棧溪北面到立霧溪出海口之間是恆春阿美族的祖居地，老祖先在清朝中葉因太魯閣族勢力發展而南下恆春，如今在大正年間日本人勢力控制新城海岸地帶後，恆春阿美族人在昭和年間又回到了祖先居住的地方，建立sumutaru部落。³⁶昭和時代的新城除了阿美族人前來此地建立部落外，這裡也有同一時期來自宜蘭、臺北的漢族移民到此開墾發展。此時的新城因為位於通往太魯閣山區、花蓮港廳、宜蘭蘇澳的交通樞紐，不但是各項交通與物資集散中心，也是山區治安、道路修護的基地，昭和末年居住在三棧溪以北的恆春阿美族人、宜蘭籍、臺北籍移民等不同來源的移民，³⁷就這樣在新城進行各項的物資交易，並藉由地域上的合作，組成一個以三棧溪以北、立霧溪以南為範圍的宗教地域組織，阿美族、漢籍移民不論是在宗教組織，或是在交易市場上都有互動與接觸。³⁸

表3：日治時期新城人口

新 城	漢人 (福佬、客家籍)	熟蕃 (恆春阿美族)	其他 (日本、中國人)	總數
昭和2年(1927)	1,978		日本335、中國39	2,352
昭和3年(1928)	1,027		日本196、中國40	1,263
昭和4年(1929)	1,028		日本199、中國150	1,263
昭和5年(1930)	2,133		日本333、中國49	2,133
昭和6年(1931)	1,780		日本325、中國41	2,833
昭和7年(1932)	874 福佬808 客家66	65	生蕃41人 日本人251人	1,242
昭和8年(1933)	931 福佬873 客家58	67	生蕃174 日本人292人	1,477
昭和9年(1934)	1,043 福佬976 客家67	71	生蕃5人 日本人74人 中國人4人	1,434
昭和10年(1935)	1,093 福佬1,029 客家64	72	生蕃177人 日本人276人 中國人38人	1,630

說明：昭和6年(1931年)以前為研海區資料。

36 簡明捷，〈恆春群阿美族的分布與遷移〉，頁10。

37 〈新城日治戶籍舊簿〉。

38 恆春阿美族人以在恆春滿州接受的土地公信仰，並在遷移過程將信仰帶至新城。昭和年間，也以土地公信仰作為聚落村社信仰核心，參與新城鎮安宮的開漳聖王廟的祭祀活動，而與漢人村落有更密切的接觸。簡明捷，〈恆春群阿美族的分布與遷移〉，頁14。

- 出處：1、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現住人口統計》（大正11年到昭和10年），1923 - 1937年。
2、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大正4年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概覽表》，1917年。
3、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大正14年國勢調查結果表》，192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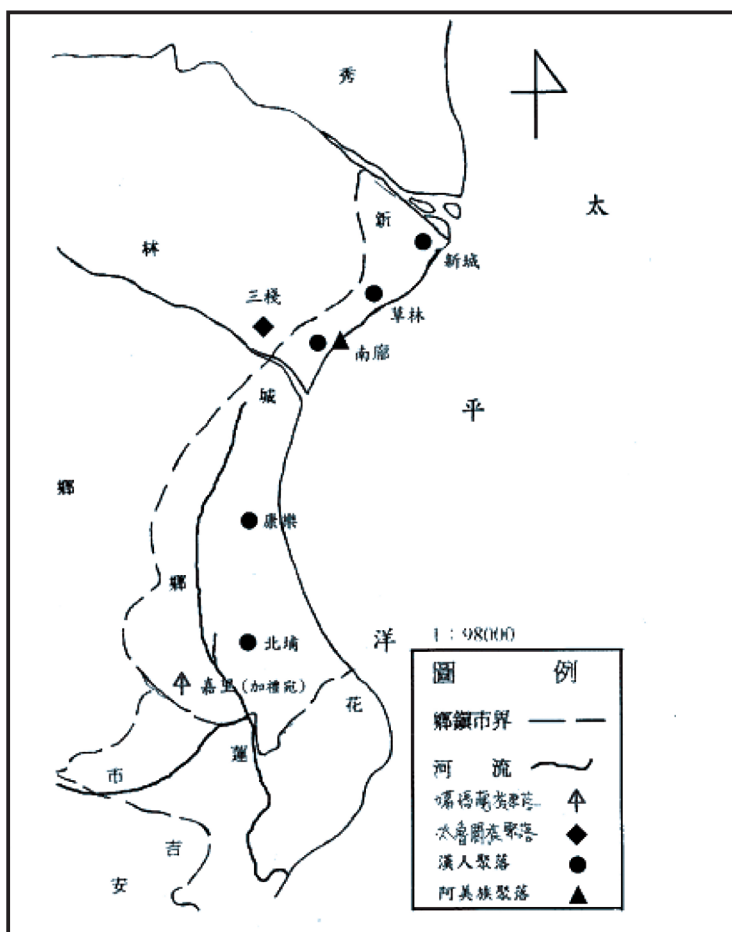


圖4、新城聚落分布
出處：筆者繪。

四、族群組成

透過文獻資料的整理，我們看到大正、昭和年間三個歷史場景中，因不同的區位而有不同的族群組成，像是恆春滿州的斯卡羅族（排灣族）、池上西面的布農族，以及新城山腳的太魯閣族，平原上則有阿美族、以及由南北遷入的漢族、馬卡道族、大武壠四社與噶瑪蘭族，當然統治階級的日本人也同時存在。藉由阿美族人的移動歷程，各自與不同

的族群有接觸。

表4：族群組成一欄表

	恆春滿州 明治、大正年間	臺東池上 (大正末、昭和初年)	花蓮新城 (昭和年間)
族群組成	漢族(客家籍多) 阿美族(熟蕃) 馬卡道族 斯卡羅族(排灣族) 日本人	漢族(客家籍略多、福佬) 阿美族(生蕃、熟蕃) 大武壠四社 布農族 日本人	漢族(福佬籍多) 阿美族(熟蕃) 噶瑪蘭族 太魯閣族 日本人

說明：生蕃、熟蕃的區隔以明治37年(1904年)之後的標準。

參、族群接觸與族群認知

前面我們整理三個歷史場景中，由人口資料來看族群組成，並略知族群間因土地耕作、市場交易，而有族群間的接觸，這一段文章則將整理田野調查所得各區域間族群相互指稱的詞彙，將這些詞彙放入其歷史脈絡中理解、分析後，進一步討論其族群認知如何建構與形成。

一、恆春滿州

在調查過程與翻閱文獻的過程中，由於族群關係的互動，經判讀而存在於遷移前的相互指稱語詞有「阿美師」、「蕃」、「擺郎」與「平埔族」等幾種：

(一)「阿美師」(a-mi-sai)

我在花蓮的訪談中，若是提到恆春阿美族人的族群定位時，報導人潘阿卻(1938年，新城出生)重複的強調說：「祖先講阮是阿美師。」³⁹根據日治時期戶籍資料顯示，潘阿卻父親潘溫祿原居滿州射麻裡大社，大社在《恆春縣志》中記載為阿眉番大射社。日本時代之後，按照日治戶籍舊簿中的資料顯示，潘阿卻的父親潘溫祿先於大正5年

39 潘阿卻報導，簡明捷新城採訪，2003年。報導人生於1938年，於新城出生，其父潘溫祿原居滿州射麻裡大社，家族中與滿州港口社、池上大陂社族人婚姻關係，按照戶籍中常住人口資料，父親先於大正年間暫居滿州牡丹灣(今旭海)，昭和10年左右至新城居住。〈滿州日治戶籍舊簿〉、〈新城日治戶籍舊簿〉。

（1916年）由大社部落轉至牡丹灣（今旭海）常住，之後於昭和10年（1935年）左右由陸路經池上大陂至新城定住。⁴⁰

「阿美師」（a-mi-sai）是以福佬話來讀Amis的結果，很接近原來阿美語的發音，Amis是阿美語中「北方人」的意思，Amis這個詞出現在卑南王勢力強大之時，是北邊阿美人相對於南邊卑南族人的說法，一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臺東各部落聽到自稱為Amis的阿美族人。

從清代的方志當中，清代阿美族南下恆春時，就曾經被記載成「亞眉仔」，⁴¹而同時期的旅外的民族誌當中，也都將恆春的阿美族人稱為「Amis」或「Amia」，⁴²日治之後日本人將Amis用來稱呼住在花蓮、臺東、屏東平地的阿美族人，而漸漸成為包含所有阿美族人的稱呼。

「阿美仔」一開始是卑南族人對阿美族人的稱呼，用阿美族的居住相對位置來作為族群稱呼，後來逐漸成為阿美族人的自稱，目前在恆春滿州仍以「阿美仔」稱呼阿美族人。臺東池上稱呼阿美族則有「阿美仔」、「pangcha?」、「滿州」等幾種說法，來區辨不同背景的阿美族移民，不過「阿美仔」在新城地區較少使用，僅於專訪阿美族人時才能得到。由滿州、池上、新城三區域所使用的語詞歷史共源性來解讀「阿美師」，可以發現這個詞彙，最早可追溯至恆春滿州時期，並隨著恆春阿美族人的移動，而到帶到池上、新城。

（二）蕃

清代的斯卡羅族被稱為「歸化生番」，日治初期後則歸類為恆春下蕃，是恆春各部落當中的重要領導者。⁴³

我在調查的過程中，有一次在滿州的公館遇到一位坐在路旁納涼的潘新福老先生，他手指相當修長、眼睛又炯炯有神，我想以他的年紀一定知道這裡的族群歷史與分佈，因此即刻上前詢問這裡是否有「蕃人」

40 潘阿卻說：「以前港口經濟不好，父親找人一起來，先是父親與大弟弟（老二）先過來花蓮，港口的田則交給二弟弟（老三）管理。庄內是親戚關係的也有一些，多半都是姑表、姨表等等。當時是用走路的來新城，中途在池上可以休息，因為有親戚，就這樣一路上來。」簡明捷2001年8月25日採訪。

41 不著撰人，《臺灣府輿圖纂要》，頁69。

42 W.A.Pick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Taipei: ch'eng Wen, 1972, pp.186, 203, 206.

43 屠濟善，《恆春縣志》，頁99 - 100。《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之一》，頁52。

存在，他回答說：「u-a（有啊）！」，接著我再問他：「佇叨位？（在哪裡？）」，他手摸胸口說：「gua to si（我就是）。」原來潘老先生是原來住在里德的斯卡羅族人（排灣族），後來搬到滿州公館居住。⁴⁴

潘新福先生的表述，可印證恆春滿州當地仍然以「蕃」來作為斯卡羅族（排灣族）的代稱，並作為人群的歸類類別之一。這類別源自於清代或至少在日治初期就已經存在，並沿用至現代。

（三）擺郎（bai-lang-a）／人

滿州公館的潘新福先生很有自信的說自己是「蕃」，他說：『過去講「蕃話」，現在擺講「人話」啊！』。潘老先生所說的「人話」，指的就是漢語（福佬臺語）；除了用「人」來稱呼漢人外，目前當地斯卡羅族（排灣族）、阿美族也使用「擺郎」來稱呼漢人，「擺郎」是排灣語，有人說這是「壞人」的臺語諧音。

清代《恆春縣志》的紀錄中，番語（排灣語）的「人」記錄為「擺郎」，番語阿美語的「人」記錄為「擔擾」。⁴⁵我們可以說前面的潘老先生因為是斯卡羅族（排灣族）的關係，因而使用「擺郎」一詞語。然而，在當代調查的過程中，我在新城的恆春阿美族部落中，也聽聞族人使用「擺郎」來指稱漢人。新城的恆春阿美族人在遷居到臺東、花蓮後，應該遇不到使用排灣語的人，因此這樣的詞句使用，源流即是從恆春半島時代，阿美族人借用排灣語來指稱漢人所留下來的。

「人」、「番」的族群稱謂也廣泛用在生活上，像是滿州鄉港口村的7-9鄰，也就是公館聚落，居民以客籍的古姓與許姓為主，日治中晚期之後聚落有一個潘姓斯卡羅族（排灣族）的集居處，村人稱為「蕃仔角」。⁴⁶而因港口溪沿岸的公館、港口灌溉水圳，也因所屬族群背景不同，而區分為「蕃仔圳」、「阿美仔圳」與「人圳」，以區別溝渠所屬

44 滿州公館潘新（永）福報導，簡明捷滿州公館採訪，2001年9月16日。

45 屠濟善，《恆春縣志》，頁111-112。番語（排灣語）的「人」記錄為擺郎，番語阿美語的「人」記錄為「擔擾」。

46 滿州公館潘新（永）福報導，簡明捷採訪，2001年9月16日。

之族群，充分反映了當地以族群為主體本位的區分方式。⁴⁷

（四）平埔仔（族）

日治初期，日本政府建立了一套現代國家的管理體系，除了土地丈量、人口清查之外，也建立起一套現代的法律體系，因為考量到原住民地區的民情風俗與一般漢人社會的不同，而使用兩種不同的法律體系；一種是在山地為主的原住民地區，施行法律為「山地特別行政法」，稱為山地行政區；另一種是以平地為主的地區，施行「一般行政法」又稱為「普通行政區」；兩者差別在於山地行政區的土地不能私有，所有權屬於國家，而普通行政區的土地則可以私有。日治初期為了解決豬勝束社、蚊蟀、龜仔角、龍鑾、四林格及八瑤六個社共225人的土地私有問題，⁴⁸除了四林格社與八瑤社之外，豬勝束、八姑角、龜仔角、蚊蟀、射麻裡、貓仔、龍鑾、大社八社於明治37年（1904年）劃入「普通行政區」，⁴⁹當中的八姑角（港口）就是阿美族人的部落。族人由「山地特別行政區」被劃入「普通行政區」，戶籍身份從延續清代的「化番」變成了日治時期的「熟蕃」，意思是住在平地行政區內的原住民，又稱為「平埔族」。

日本時代國家行政戶籍上的「平埔族」雖然包含阿美族、排灣族以及馬卡道族，不過每次在滿州向當地阿美族或斯卡羅族（排灣族）用到「平埔族」一詞時，所有人即口徑一致的告訴我：「平埔族在射麻裡（永靖），這裡沒有平埔族。」。

恆春滿州當地對於族群的互相指稱上，以「蕃」來指稱斯卡羅族（排灣族）、用「人」、「擺郎」來指漢族、用「阿美師」來指阿美族、以及用「平埔族」來指稱住在射麻裡（永靖）的馬卡道族。這些目前仍在當地使用的語詞，都曾出現於清代的文獻中，⁵⁰並且在日治時期

47 莊雅婷，『屏東縣滿州鄉港口村居民生活方式之研究』（臺南：臺南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班，2003年），頁36。

48 〈臨時山地事務調查股之調查事項〉，收錄於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誌稿（原名理蕃誌稿）：第一卷》，頁230 - 234。

49 〈恆春廳轄內一部份山地編入普通行政區域內〉，收錄於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誌稿（原名理蕃誌稿）：第一卷》，頁263 - 269。

50 番語（排灣語）中記錄人：擺朗。阿美族社名則記為八姑角阿眉社、阿眉番大射社等。排灣族、阿美族則共稱同樣記錄為「番」。屠繼善，《恆春縣志》，頁99 - 100、110 - 112。

仍然依循其原則，用來作為水利建設的依據，可以說至少在日治時期初期就已經存在，甚至可能源自於更早的清代就存在。

表5：恆春滿州的族群稱謂

	地方上的稱呼
斯卡羅族（排灣族）	蕃
阿美族	阿美仔
馬卡道族	平埔仔
漢族	人／客人／擺郎

出處：筆者整理

二、臺東池上

在調查過程與翻閱文獻的過程中，臺東池上由於族群關係的互動，經過判讀而存在於恆春阿美族人與其他族群相互接觸經驗，而產生的彼此指稱的語詞有「滿州」、「fangu」、「平埔」與「滿州潘」等幾種：

（一）Manciu（滿州）

池上阿美族人稱呼來自滿州鄉的平埔阿美族人為Manciu「滿州」。⁵¹其實池上的阿美族也來自恆春滿州，卻用「滿州」來稱呼到的平埔阿美族人，其原因在哪裡呢？

池上的阿美族（以下簡稱「池上阿美」），與其所稱呼的「滿州」（以下簡稱「滿州阿美」）同屬阿美族，「池上阿美」與「滿州阿美」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別是戶籍身份上的差異。清末恆春阿美族人已接受了土地公信仰，不論是先來的池上阿美，或是後到的滿州阿美，都是傳統信仰與漢族土地公信仰並存的情形。⁵²另外，在語言的使用上，不論池上阿美或恆春阿美都以使用阿美語為主，因此就宗教、語言上兩層面來看，日治昭和年間居住在池上的「池上阿美」與此時期由滿州遷徙到池上的「滿州阿美」，在文化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唯一作為區別的應該是明治37年（1904年）行政區改劃所造成的身份差異。「滿州阿美」

51 黃宣衛、羅素玫（纂），《臺東縣史：阿美族篇》，頁39、207、413、422。

52 簡明捷，〈恆春群阿美族的分布與遷移—以大正十四年港口社的遷移為例〉。簡明捷，〈恆春阿美族人的土地公〉，頁155 - 176。

因為改為普通行政區，使得族人的戶籍歸類由山地行政區的生蕃，改列為普通平地行政區的熟蕃，讓先來與後到的阿美族人，在社會屬性上開始有了差異。

池上阿美族指稱滿州阿美族人為「Manciu」，而我也在新城的詢問中也曾聽到同樣的詞句，應該是源自日治時期在池上地區，因為戶籍身份的差異（生蕃、熟蕃），而產生的差異，這樣用來區辨的語詞也隨著移民帶到了新城。

（二）fangud / 平埔

池上阿美族人對於大武壠四社社人稱為Fangud，Fangud從語音上判斷應為客家語，指的是原住民籍的男子。⁵³客家人對於大武壠四社社人的另一個稱呼為「平埔」，此乃源自清代、日治對西部平原上熟蕃原住民族群的稱呼，日治大正、昭和年間，客家移民進入池上後，也繼續使用「fangu」、「平埔」等詞彙，來指大武壠四社族人。現在，即使大武壠四社，或是恆春的馬卡道族人，都不是政府承認的原住民族，但地方上仍然延續了「平埔」這個歷史名詞來指稱。除了歷史語詞使用的連慣性稱呼外，在本文的脈絡中，「平埔」一詞也同時出現在恆春滿州、臺東池上與花蓮新城，並在不同的地區、地域裡代表不同群體與意義的原住民族。因此說雖然「平埔」一詞是屬於清代、日治時期指稱居住在平原地區的原住民族，戶籍屬於熟蕃的這樣一個類別人群的慣稱，但是在其指稱的對象與意義上則按照各地域環境各自獨立，並因為特定時間產生於族群之間的接觸。

（三）「滿州潘」

在一次的訪談中，我和恆春阿美族受訪者潘阿卻談了其他地方也有潘姓平埔族人的存在，報導人立刻強調：「阮e潘是滿州潘」。⁵⁴這個滿州潘讓我想了好久、好久，並且著手整理了恆春潘姓的由來：

恆春半島各部落接受「潘」為漢姓，是在光緒元年（1875年）恆春設縣後，清政府為了獎勵恆春十八番社大頭目潘文杰，而賜給各部落

53 黃宜衛、羅素玫（纂），《臺東縣史：阿美族篇》，頁39、207、413、422。

54 潘阿卻報導，簡明捷新城採訪。

「潘」姓，包含恆春縣斯卡羅族（排灣族）、阿美族。⁵⁵只是清朝在恆春縣所推行的改姓政策，政治上宣示的意義大於實用的意義，原因是當時恆春各族群家族仍然使用母語互相稱呼，新加上去的漢式潘姓在生活中並不實用，因為漢姓無法區分各自家族與族群。

不過，當恆春阿美族人開始往東部遷徙的時候可就不同了，日本時代的大正昭和之間，恆春阿美族人沿著臺東大武、卑南、鹿野、關山、池上到花蓮的過程，在縱谷會遇到各街庄村社的潘姓移民，根據民國45年（1956年）的姓氏調查資料中，在臺東縣的關山、池上、富里、玉里等地，潘姓都是該鄉鎮的前十大姓；⁵⁶以遷移過程中曾經停留的池上鄉為例，潘姓是池上鄉的第三大姓，港口阿美族的潘姓在遷移的過程當中，與其他族裔的潘姓原住民會有不少的接觸，並產生出以原居地名冠上潘姓作為區隔，分別彼此的方式。

表6：民國45年（1956）東部各鄉鎮潘姓人口

鄉 鎮	潘姓	人口比例	備註
滿州鄉	第一大姓	20.2%	原住民籍為多
牡丹鄉	第一大姓	8.8%	原住民籍為多
大武鄉	第八大姓	3.8%	原住民籍為多
太麻里	第六大姓	4.0%	原住民籍為多
卑南鄉	無	-	-
鹿野鄉	第六大姓	4.7%	福佬、外省籍為多
關山鎮	第五大姓	5.4%	-
池上鄉	第三大姓	8.2%	原住民籍為多
富里鄉	第一大姓	13.1%	-
玉里鎮	第六大姓	4.0%	原住民籍為多
瑞穗鄉	無	-	-
光復鄉	無	-	-
鳳林鄉	無	-	-
壽豐鄉	無	-	-
吉安鄉	無	-	-
花蓮市	無	-	-
新城鄉	第九大姓	2.9%	原住民籍為多

出處：1、陳紹馨·傅瑞德，《臺灣人口之姓氏分佈》，第一冊。

2、潘英，《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之分布研究（下）》，頁226 - 236、291 - 297。

55 清代為推動開山撫番，推動各原住民族社改穿漢服、留長髮，並改漢姓。恆春縣各番社在改漢姓時一律為潘姓。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下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年），頁332。

56 潘英，《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下)》（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92年），頁289 - 300、320 - 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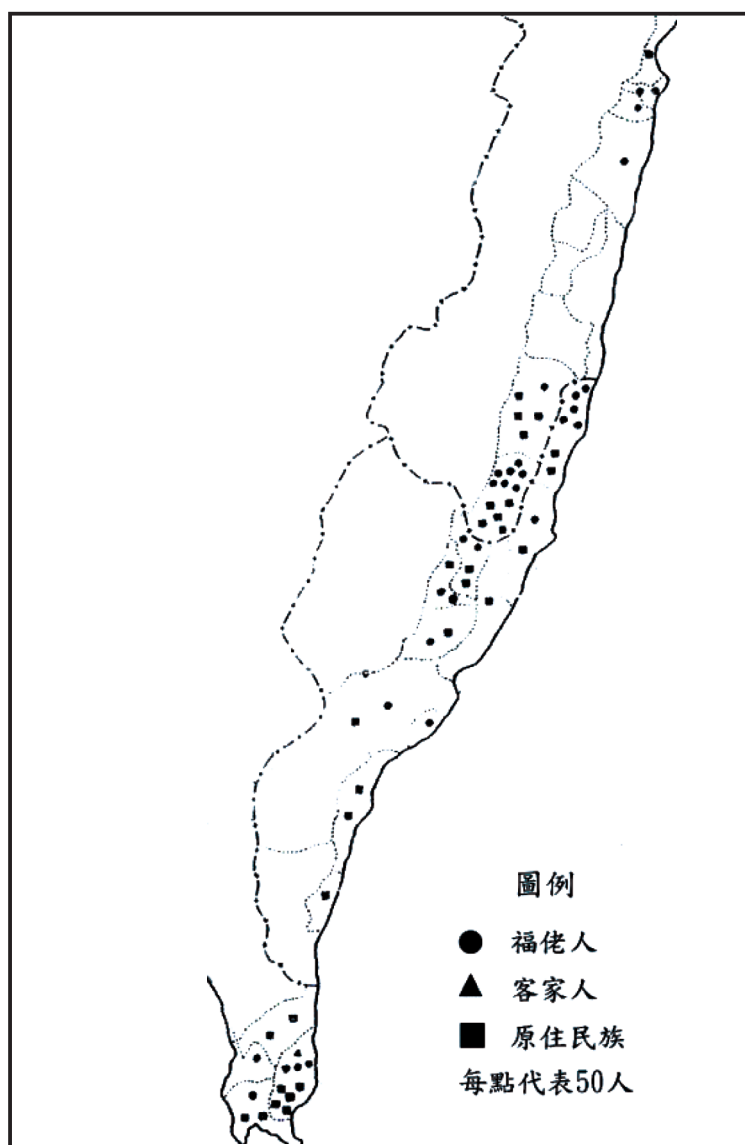


圖5、花東縱谷各鄉鎮潘姓人口的分佈

出處：陳紹馨・傅瑞德著，《臺灣人口之姓氏分佈》，第二冊。

清末到日治初期花東縱谷地帶的原住民部落仍然時有遷移與拓墾，至日治大正之後各部落逐漸定著，本文所關注之恆春阿美族的歷史遷徙，就是相當晚期的例子。⁵⁷之後人口的流動就不太明顯，也因此筆者

⁵⁷ 本文關注大正14年（1925年）的遷移，之後僅從志書中得知還有一次遷徙。年代約在昭和15年（1940年），由西片溪往臺東馬蘭、玉里的遷徙。熊金郎（主修），《滿州鄉志》，頁109。

認為民國45年（1956年）的人口調查大體上，仍然能夠呈現日治時期縱谷地區潘姓人口的大略分佈。

大武壠四社社民與恆春阿美族人一樣，許多族人在清代就改姓潘，大武壠四社社人主要分佈在花東縱谷的富里鄉、玉里鎮一帶，恆春阿美族人分佈的部落則以鹿野、關山、池上、富里等地，因此池上、富里、玉里潘姓的恆春阿美族人與潘姓的大武壠四社社人相遇的機會可就非常的大了，「滿州潘」也就成為恆春阿美族在與大武壠四社社人比較時，用來強調自己原居地所使用的詞語了。

我在當代採集到的「滿州潘」語詞，其產生的歷史脈絡與時空，就標示族群差異的功能性而言，並非產生於遷移前原鄉的恆春滿州，也不會產生在花蓮新城，應該是在日治時期遷移過程，為了區辨不同屬性的潘姓群體所產生。

（四）Vanuan / 蕃

在訪問調查恆春阿美族人關於遷移歷史的經驗與回憶時，報導人曾提到Vanuan出草殺人的聽聞。⁵⁸當時聽到Vanuan這個詞彙我以為是paiwan的訛音或俗稱，在恆春求證時卻得到否認，後來才知道這是指馬太鞍以西的地名，是布農族丹社群的勢力範圍。⁵⁹

日治時期日本人為了控制原住民勢力，對於位於高山的布農族最為頭痛，為了防止布農族對平地的騷擾，東部許多警備界線都通有鐵絲網，以將布農族隔離在蕃界。前面我們從日治文獻上得知，遷移過程確實有布農族的威脅存在，且其範圍為花蓮廳南面到臺東廳北面之間，包含臺東池上、關山、花蓮富里、玉里這一帶。

阿美族人稱布農族為Vanuan，不過對於居住在池上的漢人而言，稱呼西面山上的布農族為「蕃」。⁶⁰

58 簡明捷新城潘阿卻、滿州潘萬德、池上採訪，2003年。

59 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2年），頁57。

60 施添福（編），《臺灣地名辭書：臺東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9年），頁102。

表7：臺東池上的族群稱謂

	地方上的稱呼
布農族	Vanuan / 蕃
阿美族（生蕃）	阿美仔
恆春阿美（熟蕃）	滿州 / 滿州潘
大武壠四社	平埔仔 / fangud
漢族	人、客人 / 擺郎

出處：筆者整理

臺東池上日治時期對於族群的互相指稱上，以「蕃」來指稱布農族、用「人」、「客家人」來指漢族、用「阿美仔」來指阿美族、用「滿州」、「滿州潘」來宣稱屬於戶籍登記為熟蕃，但來自滿州的恆春阿美族人、以及用「平埔族」來指稱住在玉里、池上、關山的大武壠四社族人。

上述這些語詞、語彙，由文中放入適合的歷史脈絡中來解讀，能理解族群接觸時為求區辨，而使用了不同詞彙來自稱／他稱彼此。尤其，為了區辨屬於不同戶籍身份的阿美族人，出現了「阿美仔」、「滿州」；而恆春阿美族人為了與大武壠四社族人區隔，也使用「滿州潘」一詞，可以說是反映了當時日治時期被稱為新開園的池上，族群的多元性與族群接觸的頻繁。

三、花蓮新城

恆春阿美族人在到達花蓮之後為了與其他族群做區別，經判讀與判斷存在於日治遷移後而產生、存在於花蓮新城的群體指稱語詞有「加禮宛仔」、「恆春人」、「宜蘭人」、「南廂子」、「平埔仔」、「姓潘的」等等。

（一）加禮宛仔

從生活面來看，新城北面有一個小市集，南面的市集則是在北埔、花蓮市十六股一帶，這裡瀕臨美崙溪，溪畔有六個噶瑪蘭族的部落，於清末就由宜蘭到此開墾。噶瑪蘭族是原來居住於宜蘭的平埔族，清代遷至花蓮，在今日新城鄉南面共分為加禮宛社、竹子林、武暖、七結仔、

談仔秉與瑤歌6個部落，當中以加禮宛為最大部落，又稱為大社，也是各部落的領導者。⁶¹

恆春阿美族人日治昭和初年北上新城，需要經過噶瑪蘭族人的加禮宛部落，與行政身份同屬於熟蕃平埔族的噶瑪蘭族人相遇時，以大社的社名加禮宛仔來稱呼噶瑪蘭族。

（二）恆春人

從前文的討論，恆春阿美族移民在恆春被稱為「阿美仔」、遷徙的過程被稱為「滿州」，而到了花蓮新城後則被稱為「恆春人」，對比的是當地其他多數來自宜蘭的漢族移民。日治時期以前的新城，只有加禮宛一帶有噶瑪蘭人居住，北面都是太魯閣族人的勢力範圍。⁶²大正3年（1914年）日本討伐太魯閣族人並設立新城支廳，新城的治安逐漸穩固，原來濱海的道路狹小沙灘與沖積扇，成為移民居住與耕作發展的據點。因此，除了恆春阿美族外，昭和時代還有來自宜蘭五結、羅東、頭城各地的移民，及臺北溪洲（今永和）的漢族吳姓移民。⁶³

花蓮新城在日治昭和年間，因為是由太魯閣族人讓出的空間，因此都是移民所構成的，自然用宜蘭、恆春與臺北來區隔各群體，「恆春人」指的就是恆春阿美族人，「宜蘭人」指的是來自宜蘭各地的移民，也有將人數較少、來自臺北溪洲（今永和）的吳姓家族稱為「臺北人」的說法。

（三）宜蘭人

「宜蘭人」如前文所提，指的是來自宜蘭的移民，新城是花蓮北端的鄉鎮，與宜蘭最為接近，許多捕魚的漁民很早就透過追逐魚群而知道新城這個地方，在日治大正之後，此地區受到日本政府武力的保護，因此許多宜蘭移民就陸續來到新城發展、定居，其「宜蘭人」的說法與上段「恆春人」的說法相對性的存在。⁶⁴

61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卷》（東京：刀江書院，昭和3年（1928年）），頁883。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頁115 - 116。

62 施添福（編），《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年），頁142。

63 〈日治新城戶籍舊簿〉。

64 施添福（編），《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頁145 - 146。

（四）「南廊仔」

日治時期甘蔗產業發達，新城地區自然也不例外，除了種植甘蔗外也設有甘蔗採收後的簡易處理站，稱為「蔗廊」；新城南邊的北三棧聚落北方「南廊」，過去也設有甘蔗處理站，並且因為位於新城聚落南方而稱為「南廊」。

港口部落的阿美族人來到新城後，也被鄰近聚落村民稱為「南部（廊）仔」，由來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指恆春移民來自南部的恆春地方，其他的聚落移民則都來自臺北、宜蘭，因為恆春位於臺灣南部而稱為「南部仔」；⁶⁵另一種說法是順安人在搬到現址之前，原先住在「南廊」濱海之處，而叫做「南廊仔」，兩種說法以後者較為可信。不論是哪一種說法，南部與南廊都指的是空間，前者說明恆春移民的原鄉，後者說明恆春移民在花蓮新城的落腳處，顯示出族群本身的原居地或現居地跟其他住民群體之相對方位，是區辨不同族群或群體的要素之一。

恆春阿美族人在住過「南廊」之後，因為颱風侵襲海岸居住地的關係，已經先遷往北面後又轉往較高的西面的草林（今又稱順安）居住，今日所聽聞、採集到的稱呼，應該是當時所留下來的稱呼。

（五）「姓潘的」

前面提到滿州的港口阿美族人姓潘乃源於光緒元年（1875年），當時的政治宣示意義比較大，而到了離開滿州到東部後，這個潘姓才開始有了社會互動意義，因為縱谷地區潘姓原住民族並也不在少數，所以滿州阿美族人使用「滿州潘」來進一步說明其移民原鄉與姓氏的集體性特徵。然而，用潘姓來凸顯背景差異以區隔群體的情形也發生在新城。

在新城說到「姓潘的」這一群人，其實也包含了姓黃、賴等各姓氏，指的是來自恆春的移民，潘姓成為恆春移民集體性的代表。我們從日治時期戶籍調查資料中，發現在新城各聚落中，在昭和年間成形的新城，居住在草林的恆春移民確實以潘姓為主要姓氏，成為阿美族移民的集體性特徵，並且成為用來作為當地社會中指稱的詞彙之一。

65 林碧珠報導，簡明捷花蓮新城採訪，2003年。

表8：新城各聚落姓氏比例

	聚落內姓氏	姓氏比例
興田	雜姓	-
新城	雜姓	-
草林（順安）	一姓	71.86%（潘）
草林	雜姓	-
南廊	一姓	100%（吳）
北三棧	雜姓	-
下腳厝	雜姓	-

說明：1、聚落內姓氏區分標準，單一姓氏人口佔50%以上稱為一姓聚落。

2、前五大姓氏佔50%以上稱為主姓聚落。

3、前五大姓氏佔50%以上，但無優勢姓，稱為多姓聚落。

4、前五大姓氏不到50%，稱為雜姓聚落。分類部份參考林美容對於聚落姓氏的分類。林美容，《臺灣人的社會與信仰》，1993年。

出處：〈新城鄉日治舊簿〉。

（六）平埔族

清末到日本時代滿州恆春、臺東池上，「平埔族」是指是馬卡道族、大武壠四社等由臺南、高雄、屏東移居的平原原住民族，然而在新城時「平埔族」這個詞不但被漢人拿來指恆春阿美族人，也是恆春阿美族人用來說明自己背景、身份的用語之一。

「平埔族」一詞的使用雖有共通性，指的是平原地區的原住民各族群，像是恆春地區用來狹義的指稱馬卡道族，或是池上用來指稱大武壠四社族人，所以說兩群同屬、同樣被歸類為「平埔族」人相遇時，就會有區辨的必要，像是恆春阿美族人不否認自己是平埔族，但也會區隔自己與同為平埔族的「加禮宛仔」有所不同，在這種情形下，族人還是會說自己比較偏阿美族，或是來源是恆春的原住民族、平埔族。⁶⁶

今日，我們的法律戶籍或是社會，並沒有「平埔族」這個語詞來指稱特定族群，但是新城的恆春阿美族反而會說自己是平埔族人，恆春阿美族人會被稱為平埔族，乃源自於日治時期的戶籍身份。不過前文所提到，恆春阿美族人在恆春滿州、臺東池上時，並沒有被稱為平埔族，反而在新城這個漢人為主體的區域出現，顯示出族群的稱謂乃是因為區域中各社會族群團體，為了區辨彼此之需要而產生，並且與區域中族群組成有關係。

⁶⁶ 潘進生（阿生仔）、潘進勇報導，簡明捷新城採訪，2004年。

（七）Lobon / 蕃

太魯閣族群在日治時期被日本人隔離開來，不過後來逐漸與恆春阿美族人有生活上的接觸，被恆春阿美族人稱為Lobon-a，意思是朋友的意思。為何為把太魯閣族的人稱為朋友，原因是恆春阿美族人原來住在海邊時，多次因為颱風時的海水倒灌影響，至山腳下的太魯閣族人部落中安置。這次語詞的由來，比起區辨其他族群的社會性語詞來說，多了一份溫暖與感謝之意。

不過對於漢人而言，對於住在秀林鄉的太魯閣族人稱呼為蕃。以上的「蕃」或是「lobon」，各族群互相指稱中會有不同，也會避免重複而造成誤會。阿美族、太魯閣族、噶瑪蘭族分別使用「恆春人」、「蕃」與「加禮宛」等不同詞彙分別指稱，來區分在區域社會中各別主體，作為認知、認識對方的方式之一。

表9：花蓮新城的族群稱謂

	地方上的稱呼
太魯閣族	Lobon / 蕃
恆春阿美族	恆春人 / 平埔族 / 姓潘的
漢族	宜蘭 / 人 / 擺郎
噶瑪蘭族	加禮宛仔 (ka-re-wan-a)

出處：筆者整理

四、族群組成與族群接觸

透過不同時空背景的指稱，我們看到大正、昭和年間三個歷史場景中演出的不同族群，隨區域內族群關係與接觸的變化會產生不同的稱謂，進而成為今日在不同部落所採集到自我表述的詞彙，像是恆春阿美在恆春滿州被稱為「阿美仔」，在臺東池上被稱為「滿州」，到了花蓮新城又被稱為「恆春人」，充分的反映了不同時空脈絡下族群接觸的不同經驗。（如表10）

由阿美族人的印象與指稱，在恆春滿州時期，因為向斯卡羅族（排灣族）借地開墾而有進貢關係，同樣對於當地的漢族移民來說，斯卡羅族（排灣族）是當地的大地主、大頭目，是不可得罪的地方領袖，因此在諸多的歷史研究中一提到恆春半島，便不得不提到斯卡羅的潘文杰，

或是潘阿別等人的開墾故事。臺東的縱谷地區，因屬於布農族人的勢力，日治昭和年間雖然日本人已經布下天羅地網以保護縱谷的開發居民，但是仍然偶有會聽到零星的攻擊事件，恆春移民在遷徙移動中常會經過緊鄰山坡的丘陵地，讓進入此區域的恆春阿美移民，不得不傳達小心防範布農族攻擊與出草。最後在花蓮的新城更是微妙，前面提到恆春阿美族人最早受到太魯閣人勢力擴張影響，進而離開部落前往恆春尋找土地，然而經過百年之後，卻又回到原居地，並且因為與其有生活上的互動，而以朋友相稱，這從對立到結盟的過程，著實是時代轉移之結果；而新城南面的平原上，也因為清末噶瑪蘭族的入墾，而使得恆春阿美族人由海岸平原主要居住者，變成了比噶瑪蘭族還後來的遷入族群，舞台主角、配角的更迭轉換，正是歷史這戲碼上演的曲折劇情之一。

表10：區域族群接觸與稱謂對照表

	恆春滿州 明治、大正以前	臺東池上 大正、昭和年間	花蓮新城 昭和之後
山坡上的民族	排灣族（斯卡羅） （蕃）	布農族（蕃/Vanuan）	太魯閣族（Lobon/ 蕃）
平原上的民族	阿美族（阿美仔）	池上阿美族（阿美仔） 恆春阿美（滿州/滿州潘）	恆春阿美族（恆春人 平埔族/姓潘的）
	馬卡道族（平埔仔）	大武壠四社（平埔仔/fan- gud）	噶瑪蘭族（加禮宛仔/ 平埔）
	漢族（人/擺郎）	漢族（人/擺郎）	漢族（人/擺郎/宜蘭 人）

筆者整理

三個歷史場景的斯卡羅族（排灣族）、布農族與太魯閣族，因為繳稅關係、防禦關係與結盟關係，而有不同的用詞與記憶，恆春阿美族在三個區域經驗中也被用不同詞彙所指稱，像是在恆春滿州被稱為「阿美師」、在臺東池上被稱為「滿州」、「滿州潘」，在新城被稱為「平埔族」、「恆春人」，這些詞彙的出現皆因為不同時間點，並在不同區域中與各群體互動而不斷改變，我們由滿州、池上、新城對於恆春阿美族人的指稱，乃是因為群體互動之認知，與需要進行關係之界定而產生，出現在移動歷史經驗的不同空間脈絡中。並且，其詞彙的產生會跟區域內群體的集體性社會特徵有關係，藉由是姓氏、移民原鄉、社會身份歸

屬的特質表現出來。

肆、族群接觸與身份建構

本文前幾個段落，分別由恆春滿州、臺東池上與花蓮新城幾個區域，討論族群組成與族群接觸，恆春滿州是個以族群文化為區辨條件的地方，每個族群的指稱都是以其族群性的字眼來說明其身份；池上的大武壠四社、阿美族、布農族較早入居，池上阿美族人因較早移居池上，因而建立了自己的部落，並把較晚來到池上，戶籍身份屬於熟蕃的恆春阿美族人另外稱為「滿州」，隱含了社會身份的不同（生蕃與熟蕃之關係），以區辨阿美族內部不同群體的社會身份差異；花蓮新城時期的族群關係，因為當地人數以臺北、宜蘭的漢族移民為多，恆春阿美族移民被漢族以恆春移民的角色被定位與認知。

不同區域內因族群關係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認識方式，例如恆春時期代表的是族群特質較強勢的時代，恆春阿美族人被稱為Amis，臺東池上時代族群接觸為過渡階段，以原來居住地滿州為主要指稱特徵，最後花蓮新城時代族群關係中漢族變成了多數，這時候阿美族以原鄉移民地被認知，但用的是比滿州更大範圍的恆春來當指標與地標；從「Amis」到「滿州」到「恆春人」這幾個不同詞彙的使用，我們發現影響詞彙使用的原因在於族群組成與族群接觸，每個區域環境因族群組成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族群區分法，以凸顯不同群體的主體性與差異性。

	恆春滿州 明治、大正以前	臺東池上 大正、昭和年間	花蓮新城 昭和之後
阿美族（熟）	阿美仔（Amis源於北方人之意）	恆春阿美（滿州／滿州潘）	恆春人／平埔族／姓潘的
區辨標準	用族群名稱區分	用來源地說明生、熟身份不同	用來源地說明原漢差異

三個不同區域的族群接觸經驗中，我們發現對於族群的認識與指稱，透過不同的表述方式來呈現，恆春阿美族人透過族群間的被指稱，而被不同區域的其他族群所認識，被認識的方式中以其區域族群組成的

運作原則，並藉由社會背景的集體差異來作為區別，以原居地與地名的使用最為普遍。

故事說到這邊，我得把歷史的場景拉回到當代社會，因為這些所有的詞彙使用其實都是這十年來田野採集而來的，許多詞彙都是沒有在任何預設的情形下聽到而記錄下來的，雖然說各種詞彙屬於各歷史時空脈絡下而發生與存在，但今日仍堆疊在族人的歷史記憶當中，甚至持續不斷的傳承給後生晚輩，成為部落內流傳的族群接觸經驗。恆春阿美族人在歷史遷移中被指稱、被認知的經驗，最後也成為今日族群本身重要的歷史記憶與經驗，甚至成為族群自我表述與認知的途徑之一。

從三個不同的歷史場景，本文討論區域的族群組成與接觸如何影響族群彼此認知，而族群認知又如何成為族群建構的經驗。這篇文章作為一個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嘗試，我們可以反省在進行研究時常將文化視為一個獨立封閉的體系，應該注意到時間與空間的動態，以及區域中族群的主體文化與特性，才能具體的表現空間本身的動態與歷史經驗的趣味性。

如果今天故事的主角不是日治時期的恆春阿美族，而是清代中葉的阿美族、清代的西拉雅族，或是住在高山上的排灣族、鄒族、泰雅族人的遷徙故事，其空間的族群關係、互動，也許會依照山的陵線與溪流而出現不同變化，其歷史經驗表述的方式又是不同的海拔與曲度。

參考書目

專書

- 不著撰人，《臺灣府輿圖纂要》，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1963年。
- 石萬壽，《臺灣的拜壺民族》，臺北：臺原出版社，1990年。
- 伊能嘉矩・栗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東京都：草風館，2000年。
- 伊能嘉矩(著)、溫吉(譯)，《臺灣番政志》，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57年。
-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著)，《臺灣踏查日記》，遠流出版社，1996年。
-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蕃語研究會，1938年。
- 伊能嘉矩(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臺灣文化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年。
- 李壬癸，《臺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臺北：臺原出版社，1997年。
- 李國銘，《族群、歷史與祭儀》，稻鄉出版社，2004年。
-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周鐘瑄，《諸羅縣誌》，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林美容，《臺灣人的社會與信仰》，臺北：稻香出版社，1993年。
-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0年。
- 施添福(編)，《臺灣地名辭書：卷三臺東縣》，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
- 施添福(編)，《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
- 施添福(編)，《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5年。

- 夏黎明、呂理政（主編），《族群、歷史與空間：東臺灣社會與文化的區域研究研討會論文集》，臺東：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0年。
- 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臺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
- 清水純（原著）・余萬居・吳得智（翻譯）・詹素娟主編・校閱，《噶瑪蘭族一變化中的一群人》，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1年12月。
- 烏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著），《探險臺灣》，遠流出版社，1996年。
-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陳紹馨・傅瑞德著，《臺灣人口之姓氏分佈》，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及遠東研究所，1968 - 1970年。
- 陳榮發、夏黎明等人（著），《池上鄉志》，臺東縣：臺東縣池上鄉公所，2001年。
- 屠繼善，《恆春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
- 黃宣衛、羅素玫（修），《臺東縣史：阿美族史篇》，臺東縣：臺東縣政府，1997年。
- 張耀錡，《平埔族社名對照表》，臺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1年。
- 張耀錡，《平埔族社名對照表》，臺北市：南天書局，2003年。
-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 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東京：刀江書局，1935年。
- 熊金郎（修）・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總編纂，《滿州鄉志》，屏東：滿州鄉公所，1999年。
- 臺東縣後山文化工作協會（著），《臺東耆老口述歷史篇》，臺東：東縣文化，1999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地輿全圖》，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

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年。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年。

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國勢調查中間報：高雄州恆春郡昭和五年》，臺北市：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3年。

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大正四年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概覽表》，臺北市：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1917年。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臺北市：臺灣總督官房統計課，1923 - 1937年。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表》，臺北市：臺灣總督官房統計課，1928年。

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大正十四年國勢調查結果表》，臺北市：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27年。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誌稿（原名理蕃誌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

蔡志展，《明清臺灣水利開發研究》，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

潘英，《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下）》，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92年。

簡炯仁，《高雄縣平埔誌》，高雄：高雄縣政府，2000年。

謝深山（監修）·吳淑姿（主修），《續修花蓮縣誌》，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5年。

W.A.Pick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Taipei: ch'eng Wen, 1972.

期刊論文

周玉翎，『臺灣南端尾閭恆春的族群與歷史（1867 - 1904）』，國立

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00年。

林家君，『模糊的邊界與差異的人群：滿州鄉「里德人」的人群分類與實踐』，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孟祥瀚，『臺灣東部之拓墾與發展（1874 - 1945）』，臺北：師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

林聖欽，『花東縱谷中段的土地開發與聚落發展』，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1995年。

段洪坤・陳叔倬，〈西拉雅族成為縣定原住民族的過程及其影響〉，《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報》25，2006年12月，頁145 - 165。

莊雅婷，『屏東縣滿州鄉港口村居民生活方式之研究』，臺南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班，2003年。

黃學堂・黃宜衛，〈臺東縣客家族群之分布及其社會文化特色〉，《東臺灣研究》14（臺東：東臺灣研究會，2010年2月），頁89 - 150。

簡明捷，〈恆春群阿美族的分佈與遷徙—以大正十四年港口社的遷徙為例〉，《臺東文獻》12，臺東縣：臺東縣政府，2006年10月。

簡明捷，〈恆春阿美族人的土地公〉，《歷史臺灣》2，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1年4月。

其他

〈滿州鄉日治戶籍調查簿〉

〈新城鄉日治戶籍調查簿〉

〈滿州鄉日治戶籍調查寄留簿〉

〈新城鄉日治戶籍調查寄留簿〉

〈滿州鄉日治戶籍調查除戶簿〉

〈新城鄉日治戶籍調查寄留簿〉

Ethnic encounter and identity---A case of Hengchun Amis's
historical moving

Chien-Ming-Chieh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 ethnic encounter experience for research the ethnic identity.

This study method is base on the Hengchun Amis's move from old village to new village at 1926. On the move event, we focus on the new village area, old village area, and take on the path's village area. Then I use the historic file and do some field work to know the third area's ethnic relation. Finally, we know that area's ethnic relation affect the ethnic group to express what Amis are And become to Amis's identity. It's a new topic and interesting.

Keyword : historical move , Amis 、 Hengchun Amis 、 ethnic relation 、
ethnic group 、 ethnic encounter 、 identity